

在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的图书馆里 苏·尼·馬奴察里揚

我第一次看到弗·伊·列宁是在1917年4月3日他回到彼得堡的时候。那时我就和列宁相处在一起了。然而，当时我能设想我的一生会有追随在列宁身旁工作的幸运吗？事情的经过是这样的。当时我正在国家出版社工作，他的秘书处給 B.B. 伏洛夫斯基挂了个电话：“弗拉基米尔·伊里奇需要一位图书管理员，你能让苏沙宁·尼基金·馬奴察里揚来吗？”

伐兹洛夫·伐兹拉伏維奇把我叫进办公室，通知了这个消息，还开玩笑似的添上一句：“将来您可别端架子啊。”

1920年3月14日，在我是一个可紀念的日子，准四点钟，我怀着激动的心情走进人民委员会的会议厅，就在这里列宁跟我談了話。一見面，他就亲切地跟我問好，我的不安情緒也就随之消失了。

他让我在他身旁坐定后，問道：“您来担任图书管理员吗？”——接着問我是不是这一行的专家，是否精通图书馆业务，能不能及时送上他所需要的图书等等。我回答說，一切我会尽力做好。末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让我熟悉一下他的图书馆，随即着手工作。

走进人民委员会主席办公室，使我惊奇的是那里的陈設竟是那样简单、朴素。书本数量之少，也令我感到意外；我原以为人民委员会的主席，总該有个规模宏大的图书馆吧。后来我才明白，弗·伊·列宁只把工作与参考上必須的书籍留在办公室里。当藏书数量增加时，人民委员会的会客室旁边为图书馆另辟一間专室。还有部分图书則放在克里姆林宮列宁的住宅里。

国事繁忙之中，列宁还經常抽出时间来浏览出版物登記局送来的呈繳本书刊。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不仅收到国内的出版物，还收到国外出版的俄文以及外文书刊，并且常常亲自指示图书馆应该訂购些什么。

那么，在列宁办公室的书柜中究竟有些什么样的书刊呢？首先是卡·馬克思和弗·恩格斯的著作——外文的以及俄文的。弗拉基米尔·伊里奇对馬克思和恩格斯的信札十分感到兴趣。（当时 B.B. 阿道拉茨基正在把这些信札譯成俄文。）

革命民主主义者別林斯基、杜勃洛留波夫、赫尔岑和普列汉諾夫的文集也占有显著地位。我建议弗·伊·列宁搞一套車尔尼雪夫斯基的文集，并把它精装起来。他同意了，还囑咐把赫尔岑的文集也一同精装。

列宁的办公室里有二个“浮躁鬼”。这被列宁称做“浮躁鬼”的，原来是二只特別的旋轉书架，分放在他的书桌两旁。列宁十分重视右边的一个书架，沒一下子就让我接近它。这只旋轉书架上摆的是些每日必备的参考資料：辞典，党的历届代表大会記錄及材料，由列宁校訂和作序言的党綱修改材料，苏維埃历届大会的記錄，共产国际代表大会（II—IV）俄、德、法、英等文字本的公报，工农政府 1917—1922 年間的法令汇编，統計資料和杂志。

列宁具有高度的閱讀修养。他对目录学十分重视。无论图书馆館藏书目、目录索引还是《新书通报》等等，他都博览通观，作为汲取新书情报的主要源泉。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經常熟悉它們，他閱讀时手拿鉛笔，随时摘录。H.A. 魯巴金的著作《书林概述》曾博得弗·伊·列宁的高度评价，这是大家都知道了的。

苏联杰出的目录学家 H.B. 茲道勃諾夫写道：“可以绝对肯定，完全負責地断言，列宁这位时代的巨人，最有修养的人的一生中，不論在他的科学或政論著作中，或是在政治斗争的实践中，都尽一切可能广泛地运用了书目索引方面的材料。”

科学共产主义創始人馬克思、恩格斯的著作是弗·伊·列宁案头的常用书籍。弗拉基米尔·伊里奇經常翻閱它們，深入地钻研这些著作。无数小紙条、摘录、提綱以及打在书上的重点号，正說明了这个事实。

娜·康·克魯普斯卡娅在《列宁怎样研究馬克思》一文里写道：“在列宁看来，馬克思的学說决不是教条，而是行动的指南。他有一次无意說出了这样的語句：‘誰都要請教馬克思……’。这句话是非常中肯的。

他自己是經常‘請教’馬克思的。在革命最困難的轉變關頭，他又重新反復地來閱讀馬克思著作。我有时到他辦公室去，一看大家都很興奮激昂，但伊里奇却在閱讀馬克思著作，而且難於脫離它。”

弗·伊·列寧仔細地研讀和摘錄過馬克思、恩格斯的信件，不久前出版的列寧所寫的《馬克思、恩格斯通信集摘要（1844—1883）》，便是一個明證。

圖書館藏書數量雖然不大，但是有其特殊價值的部分，這就是列寧做過記號的那些圖書。這些記號有的做在書的邊白上，有的做在正文中；有时在封面上，有时在空頁上寫下一些批評作者的意見；或則抄錄一段，以備寫文章、做講演、搞理論或實踐活動的時候運用。這類書約有九百本左右。如果把列寧在十月革命以後作過記號的那些書籍的內容加以簡略的介紹，就可以看出這些內容是同黨和國家所面臨的最迫切的問題密切聯繫在一起的。

弗·伊·列寧為研究問題而使用的文獻的範圍，是無邊寬闊和複雜的。

弗·伊·列寧極其關懷祖國的科學，當俄羅斯著名的學者找到走向革命的道路時，他總是感到高興。列寧圖書館里就藏有范爾那茨基、季米里亞采夫、貝爾克、費爾斯曼、巴甫洛夫、斯克里亞賓、柏列尼許尼可夫等人的文集。還有達爾文、卡爾諾、拉姆柴、愛因斯坦、南辛等人的著作。

列寧圖書館還收藏N.N. 斯克伏爾佐夫—斯切潘諾夫、B.П. 彭琪—勃路也維奇等人的無神論作品。

“我最最喜愛的作者——弗·伊·列寧說，——是車爾尼雪夫斯基。他在《當代》雜誌上發表的所有文章我都從頭到尾讀過，而且不止一遍。感謝車爾尼雪夫斯基，他促成我和哲學唯物論的初次相識。他，也是第一個給我指出黑格爾在思想發展史上的作用，及其辯證法觀念的形成。由此進而學習馬克思的辯證法便容易得多了。”

在領導保衛蘇維埃國家的內戰期間，弗·伊·列寧研究了現代軍事著作。在上面提到的館藏書目中，我們可以遇見Ф. 梅林克的《民兵和常備軍》，著名的蘇維埃軍事活動家——М.В. 伏龍芝、М.Н. 屠哈切夫斯基、Н.Н. 包格達次依斯克及其他人等的著作。

弗·伊·列寧對俄羅斯古典文學抱有永不消逝的熱情。偶而有些閑暇，他總是手裡拿著普希金、涅克拉索夫、戈果里或是薩爾蒂柯夫—謝德林等人的作品在閱讀。克里姆林宮列寧圖書館里還藏有岡察洛夫、高爾基、萊蒙托夫、克雷洛夫、柯羅連科、格里鮑也陀夫、陀斯妥也夫斯基、列夫·托爾斯泰、契可夫、屠格涅夫等人的著作。

有一次，我走進辦公室，看見桌上擺着一冊《戰爭與和平》，攤開的地方正好是描寫打獵的那一段。

娜·康·克魯普斯卡婭在《文藝典籍中列寧喜愛些什麼？》一書中回憶說，弗拉基米爾·伊里奇在放逐中讀過歌德的《浮士德》，還有海涅的原著，維克多·雨果的組詩《懲罰集》；在不眠之夜耽讀過凡爾哈倫的作品，也被巴比塞的《火綫下》吸引過。

從阿里斯多芬到威爾斯，從霍夫曼到尼克索——這就是列寧在外國文藝領域中的閱讀興趣和範圍。圖書館還有古代雅典羅馬戲劇家、詩人，以及七至九世紀的中國詩人等的代表作。

列寧的私人圖書館里也不乏新生的蘇維埃文藝作品。其中有Д. 別德內依、Н. 吉洪諾夫、В. 馬雅可夫斯基等等。蘇維埃作家認為把自己的作品贈給列寧是最光榮的事情。在這些藏書中，人們可以讀到不少熱烈的、打心坎上流出的題贈辭句。“贈給親愛的伊里奇 別德內依 1919年5月1日”，這就是別德內依在贈給列寧的一冊自己文集上的辭句。

有时，弗·伊·列寧也題贈自己的著作。“贈給親愛的阿·馬·高爾基 1920年11月18日 作者題”，這是弗·伊·列寧題在一冊《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上的辭句。

弗拉基米爾·伊里奇是一個熱忱的書籍愛好者。但，對他來說，書籍從來不是崇拜的偶像，也不是目的本身。書籍，是為共產主義鬥爭的武器，這就是弗·伊·列寧對待科學的以及政治的書籍的態度。

和列寧一起工作是愉快的。他提出的要求和任務總是交待得明確、扼要。他不止一次地表示要幫我找書，當我迅速地送上他所關心的新書時又常常和我一同高興起來。多麼幸福，我得以自己綿薄微小的力量貢獻給這一偉大的事業——列寧所從事的事業。（洪丕熙摘譯《Новый Мир》1962年第1期265—267頁）